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5年5月4日

文化新论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诞生的人后来成为“80后”“90后”，这批人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变迁，成长为当代青年。作为当代中国的重要力量，当代青年的诉求和表达有强烈的时代特点。了解他们才能引导他们。

当代中国青年诉求的变迁

□廉　思

接受文化变更的速度加快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从来没有哪一代人像当代中国青年一样，成长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之中。随着人类社会靠代际经验传承塑造价值的模式发生深刻改变，观念的代际更迭将加速，文化的更新速度将前所未有地提升。在人类历史上的长久岁月中，各个社会主流文化的更替速度极为缓慢，人们终其一生，或许都生活在一种文化影响之下。而在当下，文化变更的波长迅速缩短，再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覆盖人们的一生，乃至无法完全覆盖青年成长的短短数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和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话语现象。在这一文化的影响下，当代中国青年，其政治理念已经在悄然改变。这其实不是脱离政治，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态度。青年的政治态度，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利益问题取代政治理想，生活琐事取代宏大叙事，成为影响青年政治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

更关注与自己相关的话题

在我们所做的多个群体调研中，青年群体普遍对社会话题的关注多于政治话题。而在所有话题的关注中，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受关注度最高。例如，企业青年是城市青年的主体组成部分，2014年我们进行的北京市企业青年调研显示，在目前的时政热点中，该群体关注度排在前列的，除了全民关注的反腐问题外，其余分别是“房产税加快立法”“医疗体系改革”“单独二胎政策”等，与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密。

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国家对青年的影响力上。当前青年对“神舟十号”上天的关注度远没有当初“神舟五号”上天时那么强烈，由此而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也没有之前热烈。近年来，类似神舟上天这样的国家发展重大成就事件，对青年爱国情感的激励效果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趋势。有的青年说“无非就是一次航天发射，没有必要对其感到骄傲与自豪”，还有的青年认为“自身的生活还没看到希望，干吗要关注这些东西”。可见，国家要想把握青年并使之获得认同感，单纯依靠宏大事件的激励已远远不够了，我们不仅要给青年以国家的希望，更要给他们以个人发展的希望。

权利诉求

与此同时，不同青年群体间的权利诉求差异在日益加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政治参与报告》显示，公民认为对个人发展最重要的权利由高到低的排序是经济权利、法律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也就是说，这一序列中，越是靠前的权利，对于个人发展越具有基础意义。根据我们对不同青年群体的调研显示，这些权利诉求涌现的规律，与其排序也明显相关。即当序列中的基础权利得到满足后，更高阶的权利诉求往往会显现出来。

例如，“新生代农民工”以经济诉求为主，更关注保障生计，而受过大学教育的“蚁族”和“城市白领”则以居留发展诉求为主，更关注社会参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71.9%的白领表示愿意参加志愿活动，有50.1%表示愿意参与到社会管理工作之中，而当“对自己身边的事务有不满意的地方”时更有超过半数的白领表示自己会“站出来，向有关部门反映”。同时在调查中也发现，“蚁族”群体对社会事务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公民参与意识较强。可见，随着经济诉求得到满足，青年群体的社会诉求和政治诉求将会提升。

而由自身权利诉求出发，引发的对政治判断的情绪性反馈，是影响青年政治认同的重要原因。例如，根据我们对全国5400名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显示，该群体对当前晋升制度、薪酬体系、科研管理、绩效考核等高校管理制度普遍评价较低。64.9%的受访者认为现行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体制比较刻板，缺乏灵活性。68.4%的受访者认为高校职称晋升制度多以年龄划线，“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缺少激励作用。73.5%的受访者认为高校薪酬体系设计不合理，不能体现工资收入与个人能力相挂钩。高校青年教师不像公务员那样有机会接触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这些日常工作中与之直接发生利益关系的具体制度是他们获得对国家认识的主要渠道。对管理体制不满意，将会导致他们对国家政治信任感的流失。

可以预见，青年群体的权利诉求复杂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尤其是在经济诉求之外，有社会诉求和政治诉求的青年群体，比如“城市白领”正在不断壮大。从2002年到2014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由25159万人增加到39310万人，而全国乡村就业人员总量由48121万人减少到37943万人。这意味着，青年整体的政治权利诉求将日益提升。尤其是对于诉求表达更为激进的青年群体，其权利诉求上升的速度和政治参与制度化的速度之间的差距，将相当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稳定。因此，能否将青年的权利诉求纳入到有序的政治参与中，有效回应青年诉求，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

放眼世界，今天的青年成长在日益同步的全球化背景下，构成其认同基础的，不再仅仅是家族传统、地区习俗、民族特征，现代传播营造的软环境和工业生产打造的硬环境正迅速成为引导全世界青年的决定性力量。工业标准化生产以相似的生活工作环境和方式取代传统的就地取材各具特色，现代传播则用生活化的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宏大政治。借此，这两股新力量消弭了地理空间的差异，同时建立了新的社会空间格局，其界限标准是依附于身份的工作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权利诉求。在这一新的空间中，人们旧有的身份将逐渐淡化，新身份将逐渐凸显，人们的认同、标签、归属感，都将随之改变。对于既有的意识形态建构者，这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价值观念体会和表达

青年的价值观念是一个时代最活跃的意识形态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有时虽然听不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辨析，但是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中，我们能感知到他们特殊、具体而生动的价值理想和生活准则，这些是最真实且最有活力的意识形态，而做好青年群体的思想工作，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青年价值观的沟通对话，无疑是所有群体中最具挑战性的。

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是一种典型的理性结构，其思想内容是以概念、判断和推论等理性形式表达的，而且这种表述都是经过深入思考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价值原则和实践要求的。当互联网和手机通信迅速普及后，社会传播不仅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技术基础，而且也展开了信息传递的影像化、符号化的感性传播方式，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人的意识活动主要是处于感性层面的心理活动，使得只有那些能够形象化和感性化的影视信息才能产生喜闻乐见的效应，包含于其中的价值理念、行为规则和理想目标才能得到理解和认同。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想真正成为青年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沟通的主要内容，成为在社会生活中真实而普遍发挥作用的信息权力，就必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内容视觉化、理性概念感性化的转变。

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要具有感染青年的魅力，就不能把意识形态弄得很暴露，政治态度搞得很生硬。观念、主题、态度要深深隐藏在素材、情节和细节之中，一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宣传思想工作中，我们并不缺乏正确的主题，也不缺少核心价值，而是缺少一种表达的本领和传播的能力。西方也讲意识形态，只是他们很善于表达。有些美国电影制作庞大、情节跌宕起伏、催人泪下、引人深思，看了之后，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最后觉得美国真好，变成一种自觉的选择。实际上，这叫“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工作。

我们目前搞“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工作本领还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创意，需要精致的构思设计和巧妙的表达传播。

总之，我们做青年工作，一定要学会用科学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来说服人，而不是拿大话、空话、套话来压人。我们应当利用知识优势和思想优势，用鲜活的故事和朴实的话语打动青年，把主旋律像小说一样隐藏在故事和人物之中，把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蕴含在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之中，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超越理性概念与感性意识的间隔，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同青年价值观的沟通对话，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共识。

文化视野

英国建筑遗产保护中的非政府因素

□金　磊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在世界城市的一系列特征中，国际社会特别强调它应具有独到的文化精神。伦敦是世界上发展最早的城市之一，它以理性与自由为特质的城市精神文化，成为英国文化的缩影。这里不仅有工业时代的精神，又有多元共处的宽容精神。自19世纪以来，伦敦在建筑史中，始终推进着建筑遗产保护事业，不仅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乃至社会的作用也十分巨大，这是迄今每个造访者在英伦优美的城市与乡村中，感受如画风景后得出的结论。

在许多欧美国家都倡导“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其要义是文化遗产是国家和城市的，它是历史价值与品位的表征，但它要成为每个社会公民的文化精神财富。所以，政府首先要严格按照法律去保护遗产，不能以发展的名义去违背文化遗产保护法，更不能以权代法去破坏文化遗产。同时，在法律的引导下，社会公众主动去参与保护，这是城市形象内在的精神支柱，它可以不断培育出可贵的城市文化精神，唯此，建设人文城市才不再是空话。

英国在21世纪初曾有专门统计，98%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应进行遗产的教育，88%的人认为遗产可以创造就业和经济价值，95%的16～24岁的青年学生认为应保护最好的战后建筑。历史属于全社会，更属于充满未来的下一代，根茎深埋大地，若逢雨露滋润，便可成长为参天大树而惠及后人。英国遗产委员会所辖的机构及遗产地，平均每年免费接待超过50万师生，2003年“英国遗产委员会”又调整政策，任何英国遗产委员会的会员可免费将6名19岁以下的青少年带入遗产地。早在1999年，英国就成立教育遗产信托，设立桑德福奖，对学校的遗产教育给予特别奖励。在英国一年有百项大小遗产活动，丰富有趣的项目促进以家庭或学校为团队的公众参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是英国遗产与各媒体联合举行的大型遗产保护项目，其目的在于提醒每个公民保护遗产、尊重遗产的良知，并倾力保护共同的财富。例如“英格兰印象”，让公众对深藏在民间的遗产，如家族的历史、学校、居住社区等主题再行挖掘，远至山川古迹近到身边各式各样的邮箱、标牌、广告、旗幡等，最终形成一份来自民间的网上历史档案，通过一个个“故事”掀开历史神秘面纱。

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志愿者这一群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志愿服务活动中形成的大量社会团体，已成为社会组织的新形式。英国1948年通过的《国家辅助法》中，已确定了志愿者的义务组织法定地位。近70年来，政府给予志愿者及其组织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成为英国遗产保护优秀传统之一。遗产保护的志愿者行为，再现人们的专业精神、职业道德和敬业程度，体现了送达爱心的文化精神。义务奉献已成为遗产保护上的慈善行为，在英国有近40%的成年人每周要花费约4小时做义工（项目包括为文化遗产保护效力）。英国国家信托拥有最广大的遗产保护志愿者队伍，按每小时5.8英镑收入标准计算，43万名志愿者的智慧和热情之奉献每年高达1500万英镑，国家信托用此费用再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此外，在英国颇受欢迎的公众文化遗产保护之举当属英国遗产委员会鼎力支持的“遗产开放日”。设立遗产开放日的目的，是重视遗产的价值，让更多的公众走进去，认识自己所在的城市与乡村，增加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还应瞩目建筑师群体的贡献。从遗产保护上看，英国人生性保守，很尊重传统，在建筑的修复上极其谨慎。早在1842年，英国《教堂建筑研究家》杂志就发表了一些修复的原则。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是英国文物建筑保护最权威的人物，他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成功的建筑师。1850年他说过：即使是年代较晚或制作粗糙的真实建筑，也比为早期建筑修复出的精美部分更为珍贵。在此背景下，“反修复”运动应运而生。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英国著名建筑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他说：建筑最可歌可泣者，着实不在其珠宝美玉，不在其金阙银台，而在于它渴望向我们诉说往事的唇齿，在于它年复一年、不舍昼夜地为我们守望的双眼。在此思想影响下，英国经常采取保存废墟的做法，任由在一座中世纪的古堡、教堂或修道院中，长出常青藤。残迹之美，诱发思想情怀，如约克郡北部里沃滋修道院即为一例。同样，1877年，在莫里斯领导下成立了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从而开启了英国真正的历史建筑保护运动，由此奠定了到今天仍有价值的“保护性修复”理念。

近20年来，在英国形成建筑遗产保护严格的注册制度。1999年开始有注册保护建筑师，2002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与注册保护建筑师协会决定全面协作。21世纪以来，英国每年有380亿英镑投入建筑修护之中。英国建筑学者又先后推出《英格兰乡村报告》《英国乡村的技艺：通向未来的报告》等报告，在昭示专业化建筑保护的同时，使已有的150年建筑遗产保护历程被公众所知。除了遗产开放日，伦敦每年九月中的两个周末还有一个固定的大型遗产展活动，这就是“敞开伦敦的房间”与“建筑周”，其意义在于与当代建筑师对话，提升公众的建筑审美情趣，开展公众参与的建筑评论。如今建筑遗产保护内涵又有了扩展，不仅包括关注建筑遗产中蕴含的形形色色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无形遗产，更包括向公众及民间去学习共生的保护技艺知识。从某种意义上看，英国人的生活哲学是当代工匠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潜在推动力。

英国成功的建筑遗产保护在民间的实践证明：政府应重在政策引导及法律制定，而非直接插手实行保护计划，也不干涉资金运营，只是把控住方向，用政策调动公众及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热情。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投入是极为必要的，无论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传统再造的客观性出发，政府与各级组织都要格外关注来自社会公众的作用及影响。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星星之火真的有赖于公众觉悟后的燎原之势，这是重要的趋势。

警惕空壳文化现象

□杨仁明

最近，海南临高县投入巨额资金，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中国传统牌坊群。该县是海南贫困县之一，其在职职工年均收入不足1.8万元，农民年均纯收入不足4000元。目前，已经建成的87座牌坊，形成了1.7公里长的牌坊走廊。这些牌坊制作工艺粗糙，呈现的文化类型不伦不类，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牌坊。据该县的一位副县长介绍，该工程已经耗资1.3亿元，将进一步征用农民土地2000余亩进行建设。

牌坊，是具有浓厚汉民族特色的文化建筑之一。它起源于传统社会，是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等品德所立的建筑物。有时，牌坊也作为宫观寺庙的大门标志，或用来标注地名，或作为祠堂的附属建筑，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树立牌坊是有严格讲究的。它有很浓厚的礼法色彩和专门用途。没有特殊事件和特定人物为基础，是不可能轻易建造牌坊的。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严肃性，并不是随便一个地方，随便一个人，可以想当然地随便建造。

在现阶段，我们正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而我们追求的文化，应当是基于现代科学和时代主流、符合现实环境和人们精神需求、弘扬健康社会心理的大文化。应体现出基于家国情怀的爱国爱家爱民情感，基于人性需求的求真求善求美需要，基于世道人心的公平公正道义理念，基于社会进步的积极健康阳光心态。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很多地方奉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理念。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台该怎么搭，戏该怎么唱”。山东泰安、云南丽江、四川阆中、浙江乌镇、江苏苏州、山西平遥、湖南凤凰、河南登封等地方，以其独特厚重的传统文化积累为基础，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品牌，唱响了旅游业发展大戏，对地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文化是不可能速成的，需要时间来沉淀和叠加，并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过滤。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都是独立的，难以硬性复制和翻版，尤其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时代性、特定地方性的子文化也是如此。很多地方，都重视文化发展并努力推进文化建设，希望以此来搭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桥梁，其积极意义无可厚非，应当肯定。但是，如果背离了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律，想当然地借助文化的外衣，掺杂太多的经济利益，或进行赤裸裸的商业运作，或以此获取政绩资本，搞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花架子，都可能是对文化价值的贬损或荼毒，都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视野或文化气象。我们应当明白：文化追求纯粹，给纯粹文化附加太多功利的东西是走不远的；经济追逐利益，没有利益获取的经济不成其为经济。文化和经济，二者如何联姻，需要科学地论证和摸索。否则，就会形成一种怪胎，要么亵渎文化，要么有损经济，这对文化与经济各自的发展都没有益处，也不是人们的精神向往和道德追求。

像海南省临高县的这种做法，其本质就是一种“空壳文化现象”，即徒有其表，未有其里，看似光鲜，实则空泛。这种现象，正在很多地方泛滥开来。比如，投入巨资，不惜土地，要么不切实际地建设宏大的、没有人文内涵的文化广场，要么想当然地建设缺乏文化底蕴的仿古建筑，要么借历史文化名人生搬硬套地塑造所谓的地方文化名片，这都是值得思考和警醒的。

让潜规则离开学校

□木　易

女儿在北京一所高校附小读四年级，校园环境优美，硬件设施先进。我最初更喜欢这所学校的原因是校风纯正。孩子刚上一年级时，和爱人商量教师节给老师什么礼物，谁知女儿说老师在学校说了，什么礼物都不许带。教师节当天，看到一路之隔的另一所小学门口，有很多卖鲜花的小贩和手捧鲜花的小朋友，心里很感慨，更认可了这所学校。但我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给班主任老师手机里充了些话费，以表心意。谁知第二天放学后，女儿从书包里拿出个信封，说是班主任老师让带给家长的。打开一看，是两张手机充值卡——老师自己买了同样金额的卡送回。当时觉得心里好惭愧，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和女儿班主任老师对视。

最近女儿回家总是嘀咕，说不明白班里同学为什么不选她当三好生。我和爱人就批评教育，说你肯定还是做得不够好，只学习好是不够的，还要和同学相处好。谁知女儿格外肯定地说：“我那天是有别的社团活动，如果在现场的话，可以拉拉票，肯定能选上。”听到“拉票”一词出自十岁的孩子口中，心里只是好笑，并没有过多的思考。

最近和班主任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表现时顺便说了这件事情。老师很无奈地说，现在学校不准班主任参与三好生的评选，全是学生自己投票，因为有小升初的三好生推优，所以家长们都很拼，有的孩子甚至直接拿钱买选票。我听后半天没回过神来。

试想，这些通过金钱“贿选”成为“三好生”的学生，顶着光环一路走向中学、大学，随后走向社会，成为公务员、企业家、学者、科学家等社会的“精英”，如何保证他们不会成为贪官污吏蝇营狗苟，不会学术造假趋炎附势，不会制假贩假谋财害命？更为可怕的是他们自小养成的种种潜规则习惯已经成为日常行为的一部分，很自然地成为其价值观人生观的一部分，不会认为自己的做法已经触及道德底线，是在挑战社会公德。

复旦投毒案、马加爵杀人案、贪官雇凶甚至亲手杀人案让人触目惊心，吏治腐败、学术不端现象屡屡不绝，这些现象已成为天怒人怨的社会毒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钱理群曾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接着钱先生的话说就是，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小就已经开始“培养”了。

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努力，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未来。

让我们一起努力，救救我们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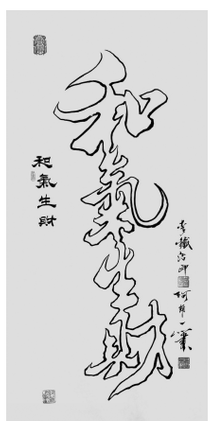
教育问题谈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和气生财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